



· 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之一） ·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因此应努力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下功夫。这一切均基于足够扎实、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既根源于历史又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知识生产、流通、消费和传承的形态。另外，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呼唤建构能够适应新技术、新挑战的有效知识体系，并形成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积极有为的学术共同体。为此，《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19年开辟“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专栏，将追踪、聚焦和探讨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诚邀相关领域学者共同参与，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和探索。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论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的 制约与超越

王列生

【内容摘要】 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的制约，既包括正面后果的五种支撑，也包括负面后果的三种迷失。由于知识身份建构功能、知识地图参照功能、知识问题凸显功能、知识工具恰配功能和知识运作规范功能的正面支撑，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最大限度地提供准入并确保研究有效。但是，前者也会对后者构成支配力量，容易导致学术涉身者“失真”“失向”和“失语”。学术研究涉身者必须以辩证姿态处置这一关系，在占有知识地图、遍扫视野制高点后，就能自由超越知识秩序，由此实现知识创新与知识谱系代际延展。自由超越的可能在于，愈是获得知识谱系功能支撑，就愈能实现知识创新与知识谱系延展。

【关键词】 知识谱系 学术支撑 失真 失向 失语

【作者】 王列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武汉 430072）

知识谱系学在从尼采 - 福柯形而上知识路线转移到形而下知识此在空间与此存状态以后，其型制功能就与不同知识域的具体学术研

究密切联系到一起。于是，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的制约关系便愈来愈凸显，而人们挣脱这种制约并实现在场知识活动主体自由的愿望也愈



微信公众号

来愈迫切。自由是对必然的超越,学术研究涉身者多大程度拥有特定议题所关联着的知识谱系,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超越并增量实现知识递进和延展的可能性。所以,知识谱系学对二者制约与反制约关系讨论的目的,其实更在于让学术研究涉身者充分意识到这一制约的正面后果和负面后果,以及反制约所必然形成的互驱动力。要使所有这一切成为知识活动现场普遍存在的事实,首先还在于学术研究涉身者对知识谱系的把握和拥有,能否在学理性知识自明中被真实激活。

—

要激活这样的学理性知识自明,当然不是客观知识抑或知识谱系学等某一型制化学问所能做到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研究涉身者能否充分认识到知识谱系或者知识谱系学的事态揭蔽,并且认识到其涉身的积极助推价值以及非涉身所必然导致的负面后果。这就迫使我们回过头来介入关联性议题,那就是知识谱系及型制化建构产物知识谱系学,究竟与学术研究有何内在正负向度的价值关系,当然也还要跟进性讨论对这种关系的理性应对与有效超越,否则就会陷入“福柯陷阱”的所谓“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的现代认识,就是知识的确实性、存在方式和那些可能性条件中的根源等问题服从有关认识客观性的单一观点:那些可能性条件在历史上,既赋予知识以对象,又赋予其形式……思想之形式化的层面”,还有“福柯牢笼”的所谓“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肉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

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

站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立场,虽然其中隐喻叙事能在狭窄边际范围内予以言说,但无论文学煽情到何种程度,其对人类知识史和知识发生史的总体判断既失实也无效。原因在于,福柯所隐喻指涉的不过是知识发生与人的生存之间,究竟是一般性必然关系垒筑还是自由关系垒筑,抑或具体知识发生事件给人的生存所带来的究竟是“必然限制”增量还是“自由开放”增量。至少在这一点上,他逊色于老黑格尔。因为后者命题揭蔽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超越,已经在已知与未知间给知识增长或者递进预留足了合法性空间。也就是以最简约的方式揭示出知识增量固然意味着必然性的增量,但这既是对前此必然性的知识征服自由增量,同时又为后此自由超越提供了自由增量机会。人类文明史或者知识史,说到底不过是这两种增量的博弈互驱进程。

任何学术研究行为,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始终同步存身于这一博弈互驱进程,既是进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也是进程所必然获取的一种存在结果。随着进程的线性递进与弹性延展,知识谱系愈来愈复杂的同时,体量也愈来愈巨大,逐渐从有限知识域一览空间走向无限知识域开放平台,而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依赖知识参照物。在所谓知识大爆炸催生的信息时代、知识社会与智慧生活情境中,知识谱系是我们寻求任何意义上“主体自由”所赖以支撑的功能杠杆,同时也理所当然成为限制无条件“任性自由”的必然力量,或者福柯式隐喻的任性自由者的“监狱”。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研究者的生存命运,情形尤其如此。因此,当我们试图以积极姿态去扭转被动生存命运时,就应该在知识谱系建构和持有中,寻求能够自由奋飞的原驱动力与坚硬翅膀,从而在良性关系状态获得最基本的五种学术研究支撑。

(一) 知识身份建构功能



任何学术涉身个体,无论知识分工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将其安置于何种知识领域、知识学科、知识专业、知识现场,都依赖与其相适应或一致的知识谱系状况,来决定其能够或者应该进入相关学术研究的身份资格,并由这种资格获得学术研究准入。准入范围、准入层级、准入场域、准入议题等,均非伦理公平问题,而是学理合法性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特定学术个体在特定学术准入中的实际程度,是以该个体准入事态过程中关联知识谱系占有状况作为前置条件。埃尔博特·费斯之所以会极其另类地切入海德格尔的传统美学“解构”,全在于他既熟谙传统美学知识谱系,又能用知识谱系学的嵌位精准目光,审视到海德格尔与这个谱系之间的变异关系。知识谱系在个体的知识身份建构中,属于基础性功能支撑,故其扎实、厚重与稳固的程度,直接决定学术研究的准入空间与学术再生产能力和条件。简言之,学术个体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谱系,就是什么样的学者,就是什么样的生存个体,就是什么样的知识身份。

(二) 知识地图参照功能

知识准入已然不成为问题后,学术研究涉身者得以进入某个具体场域,而这一场域必然存在于更宏大同时也更复杂的场域之内,依此类推,以至无穷。究竟场域内存在何种知识分布?知识域存在多少历时性意义通道与共时性价值线索?隐在的涉身陷阱与显在的涉身障碍位于何处?曾经的异时异类异人知识解困方案何以获得进展抑或又为何停滞不前?所有这些,对于学术研究具体场域涉身者而言,无异于阡陌纵横的无际原野或者街巷密布的超大都市,要想避免迷途、弯道和死胡同,以最便捷同时最安全的方式抵达预期目的地,确保特定知识行动的靶向效应,就只能借助标示清晰且布满参照物的知识地图,在其参照功能作用下获得高成功率的知识行动效果。

毫无疑问,覆盖场域的关联知识谱系就

是确保类似效果的知识地图,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称其为“speculum mentis or the map of knowledge”,也就是所谓“我们已经动手绘制一幅知识地图,在这幅地图上,人类经验的每一种合法形式都应当得到显示,它的边界应当得到确定,它和它邻居的关系应当得到阐明”。地图知识目标决定了地图的边际域大小、内置标示疏密以及意义演化纵深的长短,无论形态如何变化,预设的知识目标都会发挥参照功能,使涉身者现场捕获知识行动所需要的知识点、知识链、知识域以及彼此间的知识关系,并且所有这一切既可以是概念,也可以是命题,既可能是客观知识,也可能是猜想知识,既包括一脉相承,也包括代际转换,既会让涉身者顺利寻找意欲寻找的知识目标,也会让涉身者意外发现未曾料及的意外知识问题,诸如此类。正因为如此,为自己抑或为社会编制柯林伍德式谱系化知识地图,或者基于边际知识入场需要而寻找某种具体工具功能谱系,就像14世纪乔万尼·布伽乔为研究和学习需要而编撰洋洋四大卷《异教神谱》(*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由此满足“你想要知道的隐存于这类神话传说内核中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意指所在”。据此作逆向功能推论,则足以确认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具有非替代性知识寻踪与知识定位参照功能,因为它的一个存在维度就是知识地图。

(三) 知识问题凸显功能

人类生存史说到底照面困难、阻力和麻烦等日常坚甲之后,一次次发现问题并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进化超越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超越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社会存在形态,才能实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与此相一致，进化超越的实践过程，又不过是人类认知和反省并以知识方案支撑着所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与知识延展过程，古老的巴门尼德就已洞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实在的知识，我们接下去还要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个知识部门必定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事物的某个部门的知识”。但是人在日常状态下只能“照面”问题的“绽出形式”，却无法与“问题”真相遭遇，就仿佛千千万万人见到苹果落地，而唯独牛顿发现“万有引律”。类似“问题”都是渐悟知识照面突变而为顿悟知识遭遇的。每一个真相性存在问题，也就是知识史历程和知识方案延展过程，除非某个问题以极限形式获得终极解决，但恩格斯认为这种“永恒真理”的终极解决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人类的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正因为如此，知识问题一方面有赖知识谱系延展过程中使“问题”能够以知识形态“相遇”并被“捕获”；另一方面则有赖这些捕获后的“知识问题”与人类进一步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一道代际转换，由此形成渐进渐展的开放式知识谱系。学术研究涉身者，则正是立足或者深度介入其所关联的开放式知识谱系，才能碰到凸显出的问题并与之遭遇。从只能照面“问题”的日常绽出形式，到实际遭遇学术研究的具体“知识问题”，一定的开放式知识谱系既是事态发生的原因，也是事态发生的结果。中国古代考据学知识运作的诸如“分析源流，搜罗经义，庶几学者循其正规，朕兆可寻，考其传家流风未沫”，西方现代诠释学所言说的诸如“诠释学事实上转变为

一种理解和诠释的本体论”，皆因知识谱系所具有的知识问题凸显而获得问题捕获效果与言说靶向效应。

（四）知识工具恰配功能

无论实践中遭遇的问题，还是理论自身衍生出的问题，都需要知识方案在一定边际知识域内解困。或概念把握，或命题穿越，或推论澄明，或实验求证，如此等等。所有的知识行动都需要知识工具，没有知识工具的知识行动亦如没有日常工具的日常行动，最大可能就是行动无效甚至失败。不仅知识行动需要工具，而且工具功能匹配才会获得有效结果，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所不同的，不过在于工具型制的“硬件”形态与“软件”形态差异而已。这一点，远在“轴心时代”的各国智者不约而同地达成了此议的观念共识，虽然该共识远未至于盲从者信仰至极程度的“在轴心时代得到发展的各种思想传统延展了人类意识的边界，并在其存在本质当中显现出超验的一面”^⑪，但无论亚里士多德撰写《工具论》，或者墨翟在《墨子》中那些工具主张与工具主义实践理性，抑或古波斯人赞诵凯·古塔斯布时所崇尚的“他以千钧重的狼牙棒，为真诚寻找自由的道路；他以千钧重的狼牙棒，为真诚找到了自由的道路”^⑫，都足以确证工具价值意识，至少在那个人类特定建基时代具有普在性，而非工具理性唯西方思想史所独有的持论者所言之凿凿的那样。因此，其所呈现的一般知识事态就是，知识谱系作为一种工具形态，是跨越一切知识分类形态边际线的“通用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它不仅能以“总谱”形态对所有门类知识而言具有一般工具价值，而且还能在每一个具体门类边际中，为随机知识行动寻找有效问题解困或命题建构的匹配性知识工具。涉身者则利用知识谱系所能匹配的知识工具进入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有效知识工具匹配就是恰配性，亦即工具功能适应问题解困的知识诉求。



从知识谱系学角度而言,知识谱系之所以具有工具恰配功能,是因为任何知识工具,说到底不过是“言说知识链”上先在性的知识言说,其言说进程中功能固化的“言说”解困模式作为一种“言说型制”,当然也就可以更直接地陈述为“知识工具”,也就是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这个存在,在一个必定隐藏的深处,在一种不可还原的前后关系中,早已是一个生物,一个生产工具,一个词的工具(这个词先于它而存在)”。^⑬恰配性知识工具作为所指知识工具,存在于边际知识域或者门类知识谱系内,必须依赖谱系知识功能寻找所需工具并实现有效恰配,而对谱系学、谱系意识乃至总体性知识谱系而言,恰配性知识工具又是学术研究作为涉身者采取任何有效知识行动的所指工具,知识谱系以“能指工具”与“所指工具”的双重属性,成为学术研究及其涉身者的必备知识工具,而关键在于何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恰配功能。

(五) 知识运作规范功能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规范问题存在于知识运作的每个环节,所以也就肯定不会仅仅涉及与知识谱系学学术范式的关联性,但问题是,它同样不可能与知识谱系学学术范式无涉。譬如知识谱系学关键性存在要素之一的“秩序”问题,米歇尔·福柯阅读博尔赫斯作品之后,其所感受到的“存在着一种要比不相适的东西和不适合的东西的联结更早的无序”;这里的无序指的是大量可能的秩序的片段都在不规则事物的毫无规律的和具几何学意义的维度中闪烁;我们应该取“不规则事物”这个词源学上的意义:在这样一个状态中,事物被如此相互不同地“停放”“安置”和“排列”在场基中,以至于不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居留地,不可能在它们的下面限定一个共同的场所”^⑭,既包括已然秩序状态中的知识秩序,亦包括失序状态中内在维系着的隐存知识秩序。

对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而言,此在现象结

构及其隐存着的内在本体结构,其或直接或间接以及或远或近的关联性,都能够在普遍联系中找到某种时间、空间、意义和价值的秩序线索,而“普遍联系”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存在论命题,即所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或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⑮

按照这一思路,无论是“秩序化的显在知识秩序”还是“失序态的隐在知识秩序”,都处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之中,因而也就都处在知识史递进轨迹秩序建构与解构的循环往复中。知识谱系的能动性就在于,它的谱系形态将既往建构和结构的知识秩序变化及这种变化的“显在形态”与“隐在形态”,被客观化地完整呈现与主观性地选择呈现,由此使学术研究涉身者,在知识运作过程中因这种呈现的秩序支撑而保持知识行为规范,也就是可以规避诸如“僭越知识域混搭议题”“僭越知识边界偷换概念”“僭越知识代际讹误命题”“僭越知识学派任意指涉”“僭越知识逻辑漠视学理”等非规范行为,仿佛那些惯于非规范知识行为的鲁莽学术研究者会把前沿知识范式的“混沌学”及其知识靶向效应定位于模糊存在现象进行描述研究,甚至把自然存在中的模糊存在现象与社会科学中的语义模糊现象简单叠合到一起。岂不知作为科学范式的“混沌学”,研究的是“确定性混沌”,寻找规则运动向不规则运动的转换方式与转换动力,甚至从19世纪末数学家H. 庞加莱就已发现“按照哈密顿方程进行时间演化的某些力学系统可能展现浑沌运动”,^⑯亦仿佛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非谱系性地跨域征用“资本概念”,并不加语用说明地把“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作为组合概念,以指涉“特权”及其持有者的利益再分配无条件优先性,结果就因

其知识非规范运作导致中国语境的大面积误读。总体而言,知识谱系的时间定位能够规避学术研究中的时序错乱,知识谱系的空间定位可以规避学术研究中的场域讹误,知识谱系的关系定位可以规避学术研究中的言说任性,诸如此类。所以,在其他要素非变量状态下,学术研究涉身者愈是占有关联知识谱系的前置条件优势,其知识运作就愈规范,彼此构成正比例关系。

知识谱系学作为研究知识谱系存在形态、功能指向、建构原则、延展规律和互约换算的特定型制知识范式,或通常意义上的学科范式,其对学术研究的驱动力量就在于,使涉身者更加自觉而有效地把握与拥有非选择客观知识谱系与选择性主观知识谱系,从而使其知识素养深度内涵化与知识能力大规模增加。所以,无论是知识谱系学还是知识谱系本体,都必然是学术研究最重大的前置条件之一,甚至是须臾不可缺的支撑杠杆。

二

米歇尔·福柯在讨论规训的手段时曾有这样一段隐喻叙事,声称“由各种文牒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的个人”。^⑩之所以能将这样的隐喻叙事,语旨功能导入知识谱系学及其特定知识谱系与学术研究涉身者关系讨论的语境现场,是因为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展开“知识”议题时所说的:“分析实证性,是要指出话语实践根据什么规则可形成对象群、陈述整体、概念定义、理论选择序列……它们是一致(或者不一致)的命

题得以立足,相对准确的描述得以发挥,验证得以进行和理论得以展开的基础”^⑪,恰好可以形成其对知识谱系规则的观念呼应。那就是一方面他深知秩序和规则是知识谱系和总体性知识谱系学得以建构的内在维系,另一方面他又极不愿意肯定由此建构起来的知识谱系或知识科学对个体的规范与排斥,具有作为科学权利的规训合法性。由此不难看出,他是以双刃剑的价值判断姿态来审视知识、知识谱系和知识谱系学内在结构的秩序和规则。

当然,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知识观的立场上,不会与米歇尔·福柯一样持一种犹疑和彷徨的知识态度,而是执着地坚守“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⑫,坚守知识与知识关系既永恒地处于运动状态,又永恒地处于规律状态,并且呈现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⑬一切形式的知识和知识关系都在运动中产生和变化,一切运动变化着的知识和知识关系在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支配规律。一般存在特征的规律性与特定阶段的规律性,使得既具对象客观性又具存在变化性的边际知识谱系与总体知识谱系,由此在支配规律的杠杆支撑作用下形成其知识谱系得以维系的秩序和规范。

但这显然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观,尤其是关于知识谱系功能支撑的秩序和规范,并非在任何条件下或者任何意义维度,都处于异质性观念紧张甚至对峙状态,所以我们也就能毫不奇怪地见到他的同质性陈述,诸如“每一个陈述都是某种规律性的载体,并且不能与之相分离,因此,我们不要把某一陈述的规律性同另一陈述(可能不易预料、更为特殊、更富有



创新)的不规律性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它同标志其他陈述特征的其他的规律性相比较”,或者“考古学通过他表明时间的连续性怎么能够在它出现的秩序中,变成话语的对象,被记录、被描述、被解释、被确定为概念并提供理论选择的时机……它在一系列连续事件上制定自己的连结原则,它确定事件借以转移到陈述中去的操纵系统”。

由此看来,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特性之一的“知识综合性”,我们就可以在异质性悬置状态下进行同质性吸纳,而且条件性地将迈克尔·福柯的知识谱系秩序与规范的技术意识或技术操作方式,作为我们进行知识谱系学研究及知识谱系建构的一项基本知识原则。因为很显然,我们与迈克尔·福柯一样,承认秩序和规范在知识谱系中的必然维系作用,所不同的,只是我们采取的是客观必然中主观能动的自由乐观知识处置态度,而迈克尔·福柯采取的是客观必然作为牢笼,规训甚至压制个体知识自由,并导致精神萎靡病人般地放弃生存知识时间的“运动”,而栖身于分析知识陈述的“档案”,学术研究也就沦落为“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迈克尔·福柯的知识谱系存在于逆向时间矢量,直至起源。我们的知识谱系存在于顺向时间矢量,以起源为意义缘起,代际延展至当前事态,并瞬息万变地向着未来继续其意义拓值的知识延展。但是,我们都认同谱系线性和意义轨迹变化中支配性维系所在的秩序、规范及其内在规律性。

于是我们可以站在知识谱系学的学理立场,互约其规则性惩罚的结论,那就是学术研究涉身者如果悖离知识谱系的秩序和规范,事实上也就是无视知识谱系的规则支配性,从而在任何场域作任何知识言说之际,都以纯粹个体初始经验或随意知识处置态度作为其随机知识行动的合法支撑,放弃概念边界的历时变化与共时稳定,放弃命题的一般能指与代际所指,

放弃知识关系的直接换算与间接影响,放弃更多与这些放弃处于价值平行位置的知识秩序与规范,其结果就会带来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可以预期的负面后果。

三

在此,我们先行讨论三种常见的负面后果知识事态,即失真负面后果、失向负面后果和失语负面后果。

此议所谓“失真”,是指因缺乏知识谱系支撑导致的“定位失真”与“所指失真”,既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悖离真理”,即悖离苏格拉底所说的“事物的知识并不是从名称中派生出来的。不是,要学习和研究事物必须学习和研究事物本身……你什么时候找到了真理,就来告诉我”,亦非逻辑学意义上知识命题的“悖离真值”,即悖离艾耶尔所说的“如果‘P’根本没有真值,则‘P是真’就是假的”,当然也无涉于中国先秦语境“道”论,如老聃之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抑或如孔丘所谓“朝闻道,夕可死矣”。

定位失真针对具体知识单元在特定边际知识谱系内,失去其递进线性或者延展截面的真实位置,日常知识行为中诸如“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中生有”“关公战秦琼”“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唐宋不分”等习见性知识失误,其根源就在于谱系缺陷所致。就递进线性定位失真而论,即便如通学巨擘钱基博,虽然于本土文史不易落于“习见性”或者“常识性”知识纵向因沿秩序之乱,然而也会囿于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代代术儒利益集团尊孔极端意识形态桎梏,导致“孔子之前不得有经”谱系原则支配下的人为知识定位缺乏历史存在真实性。对于日常学习或普通身份的学术研究涉身

者而言,更普遍而且更严重的事态还在于,知识定位失真并非观念驱使使然,而是知识谱系缺陷状态下无知使然,就仿佛不知先秦时代“文献”并非文本资料的单一意义指涉,而是“文”则“文”且“献”为“献”,后者指涉约等于现代田野作业的访谈知识。唐宋以后,现代复合词构成的“文献”内涵开始全面取而代之。于是,留给学术研究一个陷阱,那就是其语旨的时序精准性缺失,对特定知识文本或某一具体学术行动来说,往往带来言说合法性的灭顶之灾。

“所指失真”的话语纠缠,较之定位失真状况更趋复杂,形象地说,如果定位问题属于“硬件”问题的话,那么所指问题就一定是“软件”问题。所指失真的复杂纠缠在于,如果没有扎实而绵密的边际知识谱系满足涉身者随机解困诉求,那么在其学术研究中,不仅会受伤于场域言说语境“能指”向“所指”的意义转换非法操作,而且会受伤于“此所指”向“彼所指”的意义滑动任意施为,不仅会出现“时域维度”所指在谱系截面的关联结构失误,而且会出现“时序维度”所指在谱系线性的因沿关系失误。“能指”向“所指”的意义转换非法操作,意即本来作为能指意义形式的某一知识单元,涉身者在未获意义转换学理授权情况下,转换为知识谱系非学理认可的意义显现知识形式,其结果就是语用动机与语用效果之间的价值悖谬。“此所指”向“彼所指”的意义滑动任意施为,意即作为边际知识谱系内已经所指定位的知识单元,由于谱系能力缺失者,擅自入场后仅仅依赖伦理权利任意知识处置,从而使其改变已然定位,并且意义滑动至另一所指位置,结果当然是知识有效性沦丧。

所指在“时域维度”的失误是指存在于谱系截面的结构关系失误,意即在共时条件下,谱系截面的知识地图展开至米歇尔·福柯象征叙事的“全景敞视主义”存在状态,确保知识行为中“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①,

而跟进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涉身者陷落失序并导致现场混乱之际,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结构存在性失误、理解性失误或表达性失误。按照结构主义存在观和知识观,处在时域谱系截面的任何知识单元,无论彼此发生过接触性影响还是各自孤立存在于某个现场位置,都会因其对该截面作为时域意义存在结构而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知识结构关系,并且因这些知识结构关系的能动变化或被动变化而改变时域截面的存在形态、存在价值、存在特征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福柯拟定的“世界的平铺直叙”知识存在方案,即所谓“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告诉我们,世界必须如何反省自身、复制自身、反映自身或与自身形成一个链条,以使物能彼此相似”^②,还是布洛克曼方案前移的“我们关心的是那种知识型必定先已存在的活动组合(contentation of actions),而知识型在每一活动组合里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目”^③,都给谱系截面每一位置知识单元预留了所指失真的机会及负面后果,就仿佛中国族谱修撰过程中,同一辈分但不同自然村落的血缘远系,或者同一自然村落五代以内血缘亲系,都会因同名抑或相似名而随时出现姓名符号的“此所指”非“彼所指”的“所指失真”错误,亦如前面提及福柯“知识型”所指与库恩“知识型”所指是针对不同知识关联关系一般。总之,涉身者在学术研究进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因“此所指”与“彼所指”的关联关系失误而导致任意意义滑动,进而导致学术研究自我否定性地出现知识失陷、失准或者失范。

所指在“时序维度”失误是指存在于谱系线性的因沿关系失误,意即在历时条件下,谱系线性的代际知识传承出现有违知识伦理的诸如无条件跨代所指,或者放弃所指时间定位的叠代指涉。跨代所指案例,如复杂的中国历代封建治理结构及其相应的职官安排,对任何意欲涉身该知识域学术研究者,无疑都会构成严重的知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一切非



专业性中国职官制度研究以外的关联介入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偶在性失误，甚至会犯唐代藩镇制度两宋指涉称谓的低水平知识漏罅。类似案例还有汉民族生存外围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变迁，尤其是变迁过程中部落变更史、迁移史、社会形态史、风尚史、语言史、战争史以及经济发展史等，差不多每一个周边民族都有自身以及互涉的历时演绎系统，以及由这一系统存在性决定的专门知识谱系。在很多知识现场，常常连最起码的所指时序因沿关系都会放弃，并且大胆地在放弃之后入场随机言说，几乎就没有知识乱伦的最起码禁忌。就仿佛连浙江人都可以完全无视“潮水”（浙江）之异名演绎为“浙江”“之江”“曲江”及“钱塘江”，以为这些所指是任何时候任何语境均可通说换称的所指，而实则大谬。

此议所谓“失向”，是指因缺失知识谱系支撑导致涉身学术研究主体自身，在线性、截面、交叉和纠缠状态知识地图面前，失去客观性知识标志物以及跟进后果的主观性方位迷乱。米歇尔·福柯讨论“记号”时就是立足于这一基点，所以他说的“记号体系逆转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的关系。相似性是那个在世界深处使得事物成为可见的东西的不可见形式；但是，为了使这个形式有可能处于光的沐浴之下，就必须有一个可见的现象，把它从其深刻的不可见性中牵拉出来”，关键是找到作“标志物”功能的“记号”，由此将内在知识关系和知识内涵“牵引出来”，从而逆向把握其所指涉的现实世界。它的“逆向”，存在于知识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谱系化知识与相似世界的符号关系建构。然而当知识谱系将这一关系建构悬置于另外的学理空间，则这种“逆向”也将在问题简约之后转化为另一种“倾向”，于是也就站在顺向位置，直接追问“客观性知识标志物”与“主观性方位迷乱”。客观知识作为主体认知成果的对象化世界，与作为对象世界本体的存在

广袤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一样，对任何主体性个体的学习涉身或者学术研究涉身，乃是星辰浩瀚的宇际深空，抑或至少是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涉身意味着冒险与探索，意味着进取与开拓，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和对于我们自身追求着的“诗与远方”抑或“在路上”，甚至意味着与古希腊智者们一道，无穷尽地实验证明辩证存在的诸如“如果‘运动’和‘静止’相互生成，那么‘运动自身’会完全静止，而‘静止自身’则会运动”，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一道理论反思唯物创世观的诸如“有大易，有大初，有大始，有大素”。因为学术研究乃“目的论”理性与“感知论”热情的双重驱动。知识谱系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涉身者提供在不同路上满足不同功能诉求的知识参照物，其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认知科学家所说的“在把真正的认知过程与非认知过程区分开来的东西中，有一部分是认知包含着的表征。更具体地说，认知过程包含着非衍生性的而不是衍生的表征……非衍生性内容由这样一些条件而来，这种条件并不要求有其他内容、表征或有意图的行动者的独立的或先在的存在”。

“主观性方位迷乱”与“客观性知识标志物”问题同源，且前者只是后者负面事态的衍生后果，也就是当知识个体以主体姿态寻找对象界面的客观知识标志物之际，一旦作为准入前置条件的具体知识谱系，以及作为宏大背景的知识域谱系状况，不能被能力匹配的主体在特定知识行动过程中，恰配性地识别而且捕获那些所必须拥有的客观知识标志物，知识个体就会出现盲区，陷入茫然，并会在方位迷失时产生躁动性现场忙乱。就发生频谱和发生概率而言，知识个体的主观性方位迷乱，谱系截面较之谱系线性都要更大，原因之一则在于，面对谱系线性时有积淀生成的社会性“历史凝视”，可以在个体的知识标志物凝视、识别和选择中隐性地发挥功能助力作用，甚至很大程

度上因“个体审视”对“历史凝视”的认同而直接形成后者对前者的能量转换。相反,面对谱系截面,虽然历史凝视余光会间接对现场事态有所睥睨,但根性以外的历史大树已是过去,历史变迁之后变动不居的当下则是全新的一望无际,而扁平的一望无际之上,任何知识凸显都显得过于缺乏可识别性,或者说在一望无际的文本草原,涉身者极难寻找身份特征明显或价值体量硕大的凸显草本。

此议所谓“失语”,与学界过往讨论中西学术落差及这种落差所造成的“非西方不足以表达”言说困局,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叠合,但总体而言,两者存在于不同的指涉维度,是不同意事件的存在形式,只不过刚好使用了完全相同的两个表意字符而已,所指边界的误读可能性,只有在具体讨论过程中通过此议边界圈定来予以规避。

所有存在界面问题域与生存解困知识域,以及立足其上的全部经验史与知识史,其既有递进因循和传承延展,所依赖的都是语言,或者语言绽出形态作为生存指涉与存在表征的不同言说,也就是索绪尔语言学所创建的“话语”。在“客观知识”与“对象话语”的同质性叠合中,知识史被合法化地转换为话语史,而我们与知识史的历时性交往与共时性交往,至此便演绎为与知识话语或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过程。既存在单向领悟性交往,亦存在于双向对话性交往,后者通常会一定程度地显形为“言说—倾听”结构的场域动态博弈。所以,包括结构主义者在内的语言之思,都是从语言结构变化的话语形态呈现中揭蔽存在,亦即“语言本体论”通往世界的“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而存在,并正是通过语言来诠释他的真实存在;甚至当他不得不沟通两种不同语言的裂隙时,他仍然是在一个语言性世界——于其中,存在得以在语言中持存——进行着诠释”。^①作为知识史学者,米歇尔·福柯更看重的是“语言显在能在自己的谱系中展现出来……一旦这一广

阔的、连成一体的区域得以构成,人们就将拥有一个能以纵向或横向的方式加以跨越的二维空间:以纵向的方式,人们就拥有关于每个词根的完整的亲缘关系;以横向的方式,人们就拥有一些被任何特定的语言所使用的词……这样,历史空间与思想网络将恰恰是重叠的”。^②

如果将语言存在作为知识存在一种独特方式予以边际有效定位,而不是像几乎所有“语言学转向”涉身者那样,从不同学理角度作非条件性全称事态处置,那么我们就的确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必须给予充分顾及的知识史思路,也就是人类生存经验的知识呈现方式,在与语言的存在关系叠合中同步性地延展着话语定量、话语存量以及话语增量的递进轨迹,于是知识形态史就这一视角而言,又可以看作某个维度凸显的话语形态史或者话语谱系。作为常规科学的知识谱系学,也就在这一切入位置获得知识点捕获机会,从而能够讨论作为知识谱系特定存在维度的话语谱系,怎样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在制约因素,亦即可以讨论“失语”沦陷的陷阱所在。

陷阱之一在于,因知识谱系缺位而导致学术研究者所议之际的“元话语失”。元话语来源于元知识,元知识来源于元问题。人类的存在史当然也是问题展开史与揭蔽史,因而也就相应地体现为海德格尔“创建”之谓的知识建基历程。^③

文明初期类存在物的自然经验与社会经验,在今天看来似乎朴素、简单甚至破碎,但其生存意义内核及其知识方式中的话语陈述本体价值指向,却与我们今天意识到的自然经验复杂性与社会经验复杂性,共同享有存在史问题线性抑或问题弹性,因而也就必然共同享有生存史的元话语血缘抑或现场话语血系。这意味着无限知识域中的任意有限知识域,或者称为边界知识域,都有其知识谱系得以递进延展并首先生成谱源,或者说缘起,或者说原始话语,或者说元话语。^④



在这一总体定位中,有两个必须清晰厘清的同质异存定位事态:其一,之所以文明之初原始话语的建基概率极大,是因为生存拓荒界域无限宽阔,几乎所有能意识到的遭遇性问题,都是后续生存界域持存性甚至恒在性问题。其二,之所以文明历程之中现场话语的建基概率较小,是因为生存深化界域逐渐呈现意义叠合性延展与全新存在问题比例性收窄,几乎大多数受挑战的遭遇性问题都是原始问题的扩大化、拓值化与递进化接续性或转换性问题,由此导致话语连续性远胜话语建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新生存遭遇与新的建基就此消失,恰恰相反,人类每经历一次文明进程中新的革命性本体拓值,就会在生存的内涵性深度与外延性广度产生话语建基机会,而且处此转折性生存环节,必然只有新的话语建基,才可能有效解困后实现生存拓值。仔细审视知识谱系史不难发现,以话语建基为标志的知识域拓荒乃是从没间断的文明积累事态,既存在于自然科学知识史亦存在于社会科学知识史,既呈现为中国言说范式亦呈现为西方言说范式。

这意味着“元话语”是一个在既有持续性之外的持续化制造过程,当然也就是包括“循环阐释”规则在内,一切解释学理论及其知识行为实际上有效性失灵之所在,只不过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晦言派”学者没有清晰地看到这一层。但对我们学术研究涉身者而言,两方面的同质异存事态都有可能成为挑战性陷阱。原因在于,无论文明之初的原始建基“元话语”还是文明进程之中的开拓建基“元话语”,作为“元话语”,都指引着其所引领的特定知识域递进路线,而作为“元话语体系”,则以米歇尔·福柯的“记号”身份,指引着柯林伍德式的整体“知识地图”或者列维-斯特劳斯的“音乐总谱”,抑或他自己的所谓“档案系统”。问题是,如果涉身者并不充分持有“元话语”而贸然闯入知识场域的话,将何以适从?极端情况,是会误入盲区中的泥沼,窒息性学术死

亡而浑然不觉所死何死。

陷阱之二在于,因知识谱系缺位而导致学术研究者所议之际的“原话语缺”。原话语来源于对元话语的衍生、再创、扩张和转换,原知识来源于超越元知识的增长、知识深化、知识位移和知识重构,原问题来源于元本体问题新认知度的进一步敞开、元存在问题新认知条件下的进一步揭蔽、元生存问题新认知对象绽出事态的进一步解困。恩格斯曾经指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进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都是知识谱系得以非穷尽延展与递进的认识论依据所在,并且这一依据高度吻合从古希腊知识论到康德知识论的理性价值传统,是知识辩证法的朴素表达方式。维柯之所以被称为知识规则的制造者,在于他认为“我们拥有一种特定的进入文明世界的方式,这一方式并不拥有自然界,它是我们创造前者所获取的而非后者……其支配观念是,使某种东西将一事物置于其所获取的特有认知关系之中。其来源于历史与社会真相的普遍重要性和特别性质,能被认为是人类的人为后果,依靠这样的后果,我们拥有关于这些事物的一种特有理解”,而这种认识的切要处,就是确立了人类社会的意义创建行为中,除了建基性的“元创建”外,还有衍生性的“原创建”,当然也就跟进事态地确立“原创建话语”在“元创建话语”之外的存在合法性与解困有效性。

无论话语体量还是学术研究涉身者的“照面”与“上手”频谱,“原话语”与涉身者的实际发生关系都要比“元话语”更多、更密切,而原话语在知识谱系中的指引、参照和诱导功能,无论谱系纵深还是谱系截面,几乎所发生的关联关系都已具有日常绽出效果,而非

深层隐存为必然逻辑制约的本体力量或者存在方式。因此,所谓“失语”作为一个知识谱系学的预设陷阱,此时就普遍而且突出地呈现为,如果学术研究涉身者在学术场域的入场之际,或者更进一步就某一具体议题进行身份定位后的言说之际,没有获得作为入场和言说前置条件的知识谱系原话语形态的资格准入,抑或勉强准入但并没有充分的原话语资源,作为场域交往中言说有效性的厚重支撑,那么就一定会在某个言说乃至倾听环节无法继续实施知识交往行为,出现“无话可说”“寡言少语”“离题杂议”乃至“胡说八道”等日常所见的学术尴尬。这实际上涉及知识身份的原话语资源享有程度与原话语功能嵌位能力,即是否可以在知识谱系的原话语指引、参照和诱导下,衍生出问题切入和议题展开的原话语延展空间与界面,从而在此议之际顺利实现意义生成与价值再造的特定知识行动目标。

四

当然,我们至此必须确立我们与知识史、知识谱系和知识作为社会存在的积极互动关系,否则就真的如同米歇尔·福柯所象征叙事的那样,在一种被动关系结构中使人类行为后果的知识制度成为进一步社会行为的牢笼,成为反知识形态的“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作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①,而作为“强制性”知识谱系异化存在方式的知识制度,至此也就事与愿违地走向知识谱系与学术研究涉身者之间的僵化线性制约关系,即米歇尔·福柯指责古典时代的“关键问题的确在18世纪存在着,却是相关于一种确定的知识的形式。鉴于此,关键问题既不能获得自主性,又不能获得激情怀疑的价值:它不同地游荡在一个相似性、想象的力量、自然和人性以及一般和抽象观念的价值——简言之,相似性之知觉与概

念之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等都重要的区域中。在古典时代——洛克和林耐、布封和休谟都是时代的见证人——关键问题涉及相似性的基础和属的存在”。^②在这种悲观知识命运中,人类抗争与求索搭建起安身立命的知识居所,却反过来成了知识居所的现实囚徒。

毫无疑问,对于在人类社会生存进取中积极、热情、不屈不挠和乐于承担救赎责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理论界面抑或实践界面,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被动知识命运,其抗拒和反弹,与其他绝大多数追求真理无限性与知识无限性的思想学派和知识学派一样,表现出对个体主体性抑或类存在主体性的价值肯定,而且这一肯定直接就是人类知识行为展开的价值前提与合法性依据。因此,事态就从知识谱系对学术研究的支撑性影响与限制性制约,转换为学术研究涉身者在每一次具体知识行为中实现对知识谱系的超越,由此也就能够不断在集合状态实现超越中的总体性谱系延展与谱系递进,从而也就可持续地在知识进展中确立人类生存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并更大规模地获得“元始建基”与“原始创新”知识史拓值后果,知识谱系增量后果,最终体现为社会本体复杂渐进的文明进化未来指向。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决定了其在知识谱系观上,选择个体主动性抑或整体能动性的积极姿态,并且由此使我们与“尼采-福柯”的消极抵抗情绪发生根本性价值路线分异。实践及其后果的认识深化或知识创新,确保人类社会在这一解困方案中,既能必然逻辑地知识建基与知识垒筑,从而在建基与垒筑的时空变化中实现具有生存支撑与庇护功能的知识谱系延展和递进,又能自由想象地获得个体与整体对知识谱系超越和扬弃,所以“作茧自缚”不是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观的学理选项,而“筑室为牢”更非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观的或然预设。其存在论支撑点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作为劳动杠杆实践后果的“类存在物”,是自为地存在



着的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①，由此也就确立起“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意识来说就生成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②其认识论支撑点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既是实际的成果又是实践的能动力。知识作为实践的产物能动地转换为接续实践行为的认识力量和改造力量，并在接续实践过程中进行检验、完善、修正和价值评估。之所以恩格斯认为“我们宁可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索到和每天还在探索的东西中，来认识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东西”，^③就在于将实践作为思维成果的前置条件，同时也将思维成果作为实践深化的前置条件，由此获得认识辩证法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得以统一的认识论解困方案，也从一个维度消解了康德可知与不可知二律悖反的存在矛盾。

因此在形而上学界面，其所触及的是一个自由与必然的终极性存在关系问题，在此可具议为知识自由与知识必然的命运应对。就人类存在史、经验史和知识史总体进程而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此岸向彼岸的价值态泅渡过程中，无时不在致力于超越必然性知识限制后尽享自由性知识解放的精神狂欢。当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等播下了未来西方理性主义的种子”^④；当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关联知识要素基础上，因天文学研究需要而在《至大论》（*Almagest*）中“建立某些能精确确定这些关系的规则，正是为了改善天文计算的目的，三角学才应运而生”^⑤；当公元16世纪王守仁倡儒学新境界“知行合一”，由此有“阳明心学”的“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

之大旨，不出于是，而活着以释氏本心之说，颇近于心学，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⑥；当19世纪达尔文发现影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诸多知识域，并从技术知识层面为我们揭蔽“不是性状造就了属，而是属产生了性状，似乎意味着我们的分类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相似性……谱系传衍上的相似（生物相似性的唯一已知的原因）便是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尽管为各种不同程度的变异所掩盖，但却被我们的分类给予部分地披露了”^⑦；以及千千万万与此类似的知识史案例，都是对人类个体抑或整体知识命运博弈进步的具体诠释。这种诠释的简约精义，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同时又是必然的……因为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⑨。总之，在把知识自由与知识必然作为知识对立统一范畴来给予事态处置之际，形而上界面的最大互约学理取向在于，愈是占有知识必然的限制性成果，就愈能跨越必然性成果限制获得知识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互约甚至与先秦孔丘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⑩的知识学辩证命题，具有一定程度的语义叠合空间。

但知识谱系学的处置重心，是在形而下界面对各种知识关系进行梳理与构建，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学理阐释的，不是思辨性地回答自由要不要超越必然的问题，而是要实证性地给出方案，有效解读如何去超越的行动路线，在此也就是要清晰地回答，如何使庞大而复杂的知识谱系成为学术研究涉身者实现新知增长的驱动力，而不是窒息和限制这种增长的知识囚笼或知识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常规科学的现代知识谱系学，不是将展开的知识谱系锁链化为学术涉身者难以挣脱的知识暴力空间，

而是在人类知识史尽可能清晰而完整的存在性敞开中,指引性地为一切学术涉身者提供现实与未来存在解困知识方案的敞亮世界。不仅不是扼杀知识自由的“必然”缱绻,而且更是托举知识自由的“必然”铁塔。一切创造性的人类知识进展,都将因坚实的托举而不断成为生存赖以寄托的现实。

注释:

- ①⑬⑭ ▪ ▪ ▪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52页、408页、4页、35页、36页、148页、216页。
- ②⑰ ▪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9页、215页、221页、286页。
- ③ Ekbert Faas, *The Genealogy of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9.
- ④ R.G. 柯林伍德:《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赵志义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 ⑤ Giovanni Boccaccio, *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
- ⑥ ▪ ▪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107页、108页。
- ⑦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6页。
- ⑧⑮⑲⑳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60页、63页、935页、938页、925页、492页。
- ⑨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跋》,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第581页。
- ⑩ ▪ 理查德·E. 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0页、305页。
- ⑪ ▪ 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海南: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3页、218页。
- ⑫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8页。
- ⑬ H.G. 舒斯特:《浑沌学引论》,朱鎡雄、林圭年译,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页。
- ⑭ ▪ ▪ ▪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02—203页、159页、185页、147页。
- 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

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 参见《老子·一章》。
- 参见《论语·里仁》。
- J.M.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纾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 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9页。
- 参见《周易正义·乾鑿度》。
- 弗雷德里克·亚当斯、肯尼斯·埃扎瓦:《认知的边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 必须特别言明,诸如此类陈述细节,隐含着我们无必要——说明的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立场异质性。作为知识悖离人类主体性即悖离经验史、认识史和功能史的“反知识制度主义”者,他所谓“我们不把各种陈述过程的方式归结于主体的单位——这关系作为对合理性的纯创造性审定的主体,或者作为综合经验功能的主体。它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场建构的知识谱系学,显然存在内在的异质性知识价值取向,亦如我们在局部状况和边际条件下,同样存在诸多同质性知识事态互约,是同一事件的正反两面。
- 米歇尔·福柯不承认有这样的“话语”存在形态,认为话语的存在规律性在于,“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整体在他们的散落和在各自的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
- Sterpen Gaukroger, *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 Analytical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7, p. 224.
- 斯科特:《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
- 达尔文:《物种起源》,苗德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 ⑮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5页。
- ⑯ 参见《论语·为政》。

编辑 张 蕾



of macro and micro public spheres,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overcoming the coated justice.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and mobility of social operation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ated justice.

Keywords: city society; coated justice; authenticity of justice; curtain of morality; transparency of rights; behavioral philosophy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Xia Ying & Xing Bing

Abstract: Marx's evaluation of lumpenproletariat is mainly negative, but later theorists such as Fanong, Marcuse and others pointed out the possibility of lumpenproletariat as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is is mainly because Marx's concept of "proletariat" is not an actual group, but a subjective position. A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changes, the rogue proletariat may also be used to fill this position. In today's radical left, this view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 Lacanized framework. Badio, Loncier, Zizek and other theories regard the lumpenproletariat or marginalized groups as the remnants of the real world, and believe that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reak through the symbolic ord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tingency and heterogeneity. However, there are serious problems in this way of thinking. The radical left neglects the rheology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its isomorphism with capital. The lumpenproletariat, which is highly expected by the Radical Left, may change its position on the side of capital. The Radical Left deviated from Marx.

Keywords: lumpenproletariat; lumpenbourgeois; proletariat; subjectivity location; Radical Left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s Restriction and Transcendence Effects on Academic Research

Wang Liesheng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has restrict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does not only include five positive consequences' supports, but also contains three negative consequences' losses. The positive supports include knowledge identity's construction function, knowledge map's reference function, knowledge issues' prominent function, knowledge instruments' matching function, as well as knowledge operation's standardized function.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has provided maximum access to the academic study and en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earch. However, in the meantime, the former has a dominate force to the latter, which may easily caus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istortion" "disorient" and "speechless". When facing the double restriction relations, academia should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dialectically. Taking the knowledge map to scan every supreme point, and freely transcend the objective regulatory control of knowledge order and norms, thus,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genealogy will be extended intergenerationally. The possibility of free transcend is depending on the function supportive of intellectual genealogy, the more it gets support, the more we can acquire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genealogy extension.

Keywords: intellectual genealogy; academic support; distortion; disorient; speechless

What Makes the Road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European Histo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 Hongtu

Abstract: World War I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leaving impressive historical legacies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e rising trend of nation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continues to cause historical tragedy, while the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have taken a new road of civilized development with demonstration after the war.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embarked on different roads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groups hav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destinies. Historians must think and further explore and answer what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tragedies.

Keywords: World War I; Europe; nationalism;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road